

# 鱼雁集

上 编

(马沛文与 11 位朋友的通信)

马沛文 袁成兰等 12 人合著

新风出版社出版

# 要 目

序 言 .....	6
-----------	---

## 与袁成兰的通信

您秉性端方耿直 我写信落笔无忌 .....	12
中国民主党派 不具党派性质 .....	14
[附录]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	16
评“见了大人不小, 见了小人不大” .....	24
报刊敢于批评省委的创举 .....	26
[附录一] 彭城才女 .....	27
[附录二] 对陈宗立截然相反的评价 .....	33
党错我也错, 赞曰“紧跟”;	
党错我不错, 斥曰“反党” .....	35
[附录] “紧跟”榜样, “反党”典型 .....	37
—— 两个类似的知识分子, 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从各打 50 大板到独挨 100 大板 .....	39
[附录一] 我对三点批评的看法 .....	41
[附录二] 我愿 .....	51
笔名的“和气”与“杀气” .....	53
[附录] 评报六条 以管窥豹 .....	56
评报遭遇 耐人寻味 .....	71
集中“统治”下的“民主” .....	75
我不要求“更象”共产党员 .....	75
书呆子制造的幽默 .....	79
主人的命运掌握在公仆手中 .....	81
[附录] 我有这样一个丈夫 .....	82

历时五个月 闯过登记关 .....	96
世界还有真人在 .....	98
“惹麻烦”与“讨喜欢” .....	100
“普天之下，莫非王‘书’； 率土之滨，莫非王‘文’” .....	107
用一生积蓄为人民说话 .....	108
关于《放言集》封面设计的建议 .....	110
[附录一]朱静为什么17个月领不到工资 .....	111
[附录二]法胜了权 正压了邪 .....	114
“官谣”与“民谣” .....	119
[附录一]寻真 .....	121
[附录二]心碑万岁 .....	123

### 与王工的通信

“一絮”接着“一絮” 活着有点意思 .....	127
[附录一]全国人大代表王工建议 .....	128
[附录二]全国记协对建议的答复 .....	129
“最慰当年成右族，幸甚平生绝左缘” .....	130

### 与邓伟志的通信

甘当理论界的“马前卒” .....	133
强调制度有教条之嫌 .....	134
出现贫富悬殊 是种历史进步 .....	138
《实》文的作者群，为何大多没好下场？ .....	139

### 与邢亚辉的通信

名“辉”与性别之关系 .....	143
我从“太平”陷入“大乱” .....	144
感谢为我的名字写了论文 .....	144

关于“人生是怎么回事”之我见.....	149
---------------------	-----

### 与吴敏的通信

〔附录〕评《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性质》.....	159
任何意志都须在潮流面前退让.....	161
感激你对拙稿提的意见.....	163
领导人在政改问题上的矛盾性.....	164
读书若有所得，“万户侯”不易也.....	166
开记者批评省委之先河.....	166
何新胡说八道 歪曲科社学说.....	168
好书不能出版 令人可悲可叹.....	169

### 与李石生的通信

清朝要有人大、政协、作协， 世上就少了一部《红楼梦》.....	173
------------------------------------	-----

### 与李鸿烈的通信

深陷矛盾、苦恼、惶惑之中.....	176
老百姓很穷 “公仆”们很富.....	177
能如此吸引我的书很少.....	180
写了篇驳斥“万言书”的论文.....	181
我曾被打成右派理论家.....	182
历史岂能随意剪裁.....	183
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揭‘竿’起义”的伟大胜利.....	183
——论《实》文“横空出世”的肇划历程和轰动效应 《附录》“清污”闹剧是这样刹车的.....	199

### 与邵景均的通信

给思想僵化、教条活跃者一副清醒剂.....	203
-----------------------	-----

吃饱穿暖有事干，足矣！ .....	203
舆论监督，生存纸上；监督舆论，落脚现实 .....	204
最有用的是才智，不是财产 .....	205
凡做过贡献的人，历史不会忘记 .....	208

### 与郑本法的通信

两张报纸 两个极端 .....	210
青海告状 我在“侯审” .....	212
党史著作往往既不“信”也不“直” .....	215
您的书是对左毒的有力清洗 .....	216
以“十目一行”的功夫帮您勘误 .....	217
《放言集》也有错误观点 .....	218
勘误《放言集》 你是我的师 .....	218

### 与贺国建的通信

对《米脂县志》的一些意见 .....	223
读了《放言集》 想写读后感 .....	225

### 与薛征东的通信

不畏风险痛贬时弊 这类文章已经久违 .....	229
婉谢报纸相邀请 悠哉游哉度晚年 .....	232
此书无人敢出 真是历史笑话 .....	233



# 序 言

马 沛 文

这部《鱼雁集》是从朋友之间的通信中选编出来的。对此书名，许多读者会一目了然，可有的读者也许纳闷：为什么不直白地就叫“书信集”，而取名《鱼雁集》呢？

## “鱼雁”与“书信”之关系

著名的古诗十九首有篇《饮马长城窟行》，其中就讲到“鱼”与“信”的关系：

客从远方来，遗 [ 读“伟”，意为“赠与” ] 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雁”呢？也是“书信”的代称。

汉武帝时，有个姓苏名武的官员，出使匈奴，遭到扣留。匈奴贵族，威胁利诱，要其投降。他坚拒不屈，就被流放到当时称做北海的贝加尔湖畔牧羊，熬着“雪地共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 词出二、三十年代中、小学里流行的《苏武牧羊歌》 ] ”的艰苦岁月。

汉昭帝即位，匈奴与汉和亲。汉求其放回苏武，匈奴诡称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亦向单于诡称：“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系帛书，

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视左右而惊，谢 [表示歉意] 汉使曰：“武等实在。” [《汉书·苏武传》] 于是就有了“雁足传书”这个典故。

书名直白固然可以，含蓄点也可以嘛！

## 我的书信的不同命运

我有保存书信的习惯，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政治的日益清明，朋友之间的书信往还也频繁起来，互相通报情况，彼此交流思想，觉得既有趣味，更有意义。于是，就把这些信一封不落地收藏起来。至于编辑成书，当然不曾料及。但日久天长，这些信真可谓“积案盈箱” [语出《隋书》，形容文字资料之多]。记得1990年9月从办公室“迁”回家中，信件已逾两千，于是，彻底清理一次，以后又几经淘汰，到准备编辑《鱼雁集》时，仍有1215封之多。

那么，我给朋友们的书信的命运如何呢？情况基本不明。于是就一一联系，结果得知：有的出于“警觉”，当即“付之一炬”；有的慑于“形势”，只好“毁之大吉”；有的几次“乔迁”，已予“处理”；有的并未经意，随时散失了。

比如，外地有位学者，回信云：“1957年和‘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因私信被‘断章取义’而挨整，总有一些人喜欢以曲解私信整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他们那里，什么隐私权、言论自由，统统是资本主义货色。因此，我不得不把一批有真情实感的，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的珍贵信件及时付之一炬”。又云：“中国的‘文字狱’传统，太可怕了”，我这样做是“为了自我保护，也为了保护朋友”。

再如，北京有位教授，我打电话问及给他的信是否保留时，他有点吃惊地回答：“什么？你的信，唉！早已不存在了。”他是一位对一切无所谓、不在乎的人物，自然对朋友的信，也持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与前边提到的“双保”意识决无关系。但信的命运是一样的：化为乌有了。



不过，对我的信，也有一些朋友是“珍藏”的。如山西一位年轻的副教授，在顺便来京时，就带来一大叠信，而且要求我用过璧还，以便他继续“珍藏”。我打开一看，为之一惊：因为，他把朋友们的值得保存的信经过精心剪贴，装订成册了，这一叠信是他从册子上拆下带来的。

要是没有一些朋友“珍藏”的这些信札，现在这样的《鱼雁集》怎么能编得出来呢？

### “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

写信与写文章绝不相同，前者的自由度极大，不必考虑什么谋篇布局，也毋须讲究什么遣词造句，更不必顾忌怎样写才不致影响文章的发表，几乎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明代文学家袁中郎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给相知的朋友写信正可以这样。

生活在要求“舆论一律”、“高度一致”的国度中，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许多认识和见解，往往“不合时宜”，甚至“直刺时弊”，发而为文，决难刊用，书而为信，自然无碍了。

苏轼在《录陶渊明诗》一文中写道：“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心中有话，真想一吐为快，可说出来就会开罪他人，要是咽下去，只能憋闷自己，我觉得宁可开罪他人，所以说出来了。

给朋友写信，又与此大异。因为，开罪的“他人”，决非收信之人，亦非平常之人，而是要求别人都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大人物，这样的人还能“逆”，还敢“逆”吗？我们这类信，还能编而为书，公之于世吗？我想，既然是“大人物”，就该有容人的“大雅量”和容言的“大气度”嘛！听听几个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又何妨呢？于是，只能仿效苏轼的口吻：“以谓宁逆人也，故卒‘编’之”。

## 编辑方针 编辑内容

为保持这些信的原貌，我们确定的编辑方针是六个字：只删节，不增改。

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四：

一，选编：淘汰不必收入的信件，收入的信件要删除不必要的段落和词句；

二，标题：信与文章不同，是没有标题的。编辑成书，就不能不加标题，由于有些信内容驳杂，有些信篇幅甚长，还需多加标题，以利读者翻阅；

三，注释：为便读者，作些必要的注释。但不标注字，加方括号附于文后以与原信中带圆括号的解释、补充性的文字相区别。

四，附录：为了充实内容，选编或撰写与信有关的文字，作为“附录”。

这就算序吧！

1999, 1, 27 初稿, 1999, 10, 27 修改, 2002, 2, 23 改定

## 《鱼雁集》主要作者暨责任编辑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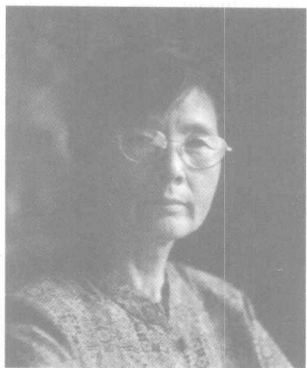
**马沛文** 1921年生，陕西米脂县杨家沟人。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人民日报》编委；《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参与和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宣传。同时，积极参加国内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对那条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无穷灾

难的左倾路线痛加批判。

1988年与《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陈宗立合写《法与权、正与邪的一场大搏斗》的长篇述评，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破天荒地从理论高度揭露和剖析了青海省委制造和坚持的一桩大冤案，影响强烈：有的读者称誉作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共和国的太史公”。

1996年出版的《放言集》，就收集了他在研讨会上的41篇发言和批判青海省委的有关文字，受到热烈好评：“立论准确、鲜明、尖锐，一针见血，又富有逻辑力量，更有感染力”；“千百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代言人”。

《放言集》及书中的《自然美三题》在海内外评奖活动中，分别获奖。他的名字，被收入1991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和1999年香港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袁成兰** 1938年生，笔名澄蓝，江苏睢宁县人，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为徐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高级编剧，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江苏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戏剧家协会会

员，江苏杂文学会理事，江海书画会会员等。出版的作品有：《澄蓝爱情诗选》，《澄蓝抒情诗选》，《澄蓝诗书画选》，《澄蓝剧作选》，《澄蓝杂文选》，《直面人生》，《拂云飞》，《昨夜春至》，《新诗评论》，《我当被告》，《心碑——彭德怀的故事》等10余本，300余万字。

袁成兰不仅在文化艺术领域中有许多“家”的头衔，在社会上也有一个“家”的称号：“打抱不平家”。她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她说：“能忍恶人害我，难忍好人受害”。常常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甚至打官司。因此，徐州市的群众又尊称她是“彭城侠女”、“女济公”。

# 与袁成兰的通信

您秉性端方耿直 我写信落笔无忌

尊敬的成兰阁下：

我们素昧平生，可又不得不冒昧给您写信，而且还可能犯您去港之前“屡败屡犯”的“错误”，说些“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了”的话。不过，“以文窥人”，即使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也有绝对的安全感。您那端方耿直的“秉性”，消除了我坦陈的“余悸”。我想，说得不当，指出可也。指得对，衷心接受；指得不对，照直驳回（我们是个人之间通信，您知我知而已，纵有纰谬，决无扩散之虞）。如无此等气量，哪敢给您写信呢？您对顶头上司的提问，尚且如此舌剑唇枪，使他招架不遑，最后败下阵去，不得不赞您“好厉害啊”！我算什么，怎敢造次呢？

## 面对“项斯”其人 大说“项斯”其善

写不写信，我好犹豫。我不像唐代的杨敬之：“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唐代诗人，杨敬之《赠项斯》绝句的前两句是：“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我是不大向人们称扬“项斯”之善的，当着“项斯”更不屑这样做。可是读了阁下的大作《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实在抑制不住面对“项斯”其人，大说“项斯”其善的冲动了。

昨天上午，我向文艺部的一位编辑推介朋友的一篇杂文，他顺手塞给我一本《杂文界》，说：拿去翻翻。回到办公室，翻到阁下的文章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见“附录”）就看。一看，马上被“奔马图”和“王关妻”这两个绝例吸引住了。我几乎是屏着呼吸把大作读完的。使我震慑的，是您那像苏轼说的“精金美玉”的文辞，尤其是那“锋颖逼人”的思想。可以想象，您写此文时，一定文思泉涌，也有点像苏轼说的“不择地而出”吧！阁下的文章，为巾帼争气，让须眉壮气，更使广大知识分子解气。

## 个性能否解放 关系民族兴亡

中国知识分子虽有“物美价廉”（该长的工资不长，价就更廉），经久耐用（英年早逝，既不久，也不耐）的美誉，那只是一面；知识分子还有其另一面，他们有自己的头脑，有独立的人格（像您说的“禀性”）。所以“该说的不说”，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愿重复那些八股式的老调；“不该说的说了”，也往往是因为他们要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独特见解。英国哲学家穆勒说过：“什么时候一个民族会停滞不前呢？当人民中的个性陷于消灭的时候”。这是天经地义的哲理。中华民族所以常常出现近乎停滞的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个性的人太少；中华民族所以不完全停滞，就是具有个性的人毕竟还有，阁下就是突出的一个。现在，有的曾被目为精英的，已落入“败类”，但那是极少数。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种种“政治灾害”之后，在批判“两个凡是”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更新许多观念之后，个性在日益解放，素质在逐步提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着眼于长远，中国依然大有希望。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了一段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至理名言：“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

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实践背弃了自己的理论，急于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始终带着“完全的空想”的性质，就是自然的了。个性解放问题，一直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

## 奴在身者，寥寥；奴在心者，夥夥

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中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随着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随着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奴在身者”寥寥；随着现代迷信的肆虐，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逞威，“奴在心者”夥夥。不管这“奴”的表现是违心的，还是真心的，都一样。古代经学家倡导：“以圣人之为是非为是非”，现代迷信则变本加厉。因为，中国现代的“圣人”实在太多。许多领导，包括阁下的顶头上司，以至等而下之，像《新星》中的公社书记潘苟世（他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苟逞威风于治世”；世一乱，他就威风扫地了）都是自视“圣人”或“准圣人”的。你不听他们的，基本上和不听党的是一个含义。阁下的领导对您如此不放心，就觉得您是往往以自己判断的是非为是非；至于圣人，认为您根本未放在眼里。这还了得！

## 中国民主党派 不具党派性质

您未加入共产党，而是民进的成员，这的确体现了像您对提问的得意的回答：“信仰自由嘛”！我是共产党员，我尊重一切民主党派的同志们，但我说一句也许您觉得不中听的话：中国的民主党派实质上还不够不上党派的资格，充其量，与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不相上下，起不到政党应起的那种作用。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大体上揭示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为什么当共产

党“辱”（如“文革”），民主党派就一起“辱”而不能“荣”呢？为什么民主党派的监督就达不到制约共产党的“为所欲为”，使它不能发动给中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带来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共产党的错误只能靠自己纠正，民主党派不能监督它纠正呢？要是这样，中国又何贵乎有那么多民主党派呢？当然，这是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阁下如何精英，也实在无能为力。

## 只有抗灾义务 没有逃难权利

大作写道：“总之，港展期间，我仔细地想了又想，确实没有辜负领导的关怀，真的做到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没说。”阁下，是这样吗？您对“受迫害了吗？”的回答好，您对邓小平的肖像的题词也行，您对为什么不参加中共而加入民进，回答得更漂亮。这些，您的顶头上司，无法置一词。但是，您对“大陆的灾难太多”的回答，就不是无懈可击了。

您说：“不管自然灾害，还是政治灾害，我们只有抗灾的义务，没有逃难的权利”。这思想，熠然烛天；这语言，铿然震地。但从阁下领导的角度看，未必如此。为什么要说“政治灾害”呢？为什么要说“抗灾”呢？这还是对党的感情问题嘛！为什么不能像著名的政工专家曲啸那样，说那是娘打孩子，为了孩子好嘛！怎么能因为娘打了几下，就负气地跑到境外去呢？当然，如果这样，就不成其为袁成兰，而变为“袁成啸”了。但，阁下的领导多么希望您“脱胎换骨”，不再是袁成兰啊！这样，你在作诗、写字、绘画、编剧之外，又添一绝：政工专家，说不定也会成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呢！

## 大作几乎通篇在出领导的洋相

阁下的大作，几乎通篇在出领导的洋相。公开发行的刊物，他们



不会看不到，有何反映呢？他们会认为您“禀性”难移，仍然不以“圣人之为是非为是非”，他们又如何对待你呢？您目前的处境怎样呢？还是种瓜不得瓜，得了豆，甚而只得了芝麻吗？殊念！

拉杂写来，出言无忌，尚望理解。顺候  
夏祺！

马沛文 1989年7月30日

[附录]

##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澄 蓝

敝人年近半百，由于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还有墙，经常碰壁。其多因“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了。

例如那年，见一位政客贴一位好人的大字报：“这幅正面奔驰的马，一直悬挂在其卧室的东墙上，显然是向往西方，想向西方逃跑……”当时我本该说：“还真的来，他有海外关系，平时生活处处模仿西方。”而我却没有说这“该说”的话，而说了“不该说”的：

“假如这幅画挂在南墙上呢——向北京？”

“不该说”的说了，能不倒霉？活该！

又如“文革”期间，大家批判我的剧本时，一位自称大老粗的领导，指着我说：“连王关的老婆都打倒了，何况你这黑作家？快交代和王关妻子有什么关系？”

“哪个王关？我不知道。”

“装蒜！你没听见？大喇叭不还在喊着吗？——打倒王关妻！”

“噢，王关戚，”我笑了笑：“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简称，不是谁的老婆，全场哄笑，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何必让人下不了台呢？“应该随方就圆嘛。”活该隔离十九个月。